


项目基金：2020 年广西科技基地和人才专项（项目编号：2020AC19228）；
2021 年广西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1CXW005）

我国社交媒体演进的 可视化知识图谱研究

党 琼 著

 燕山大学出版社

· 秦皇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国社交媒体演进的可视化知识图谱研究 / 党琼著. —秦皇岛: 燕山大学出版社, 2022.12
ISBN 978-7-5761-0404-2

I. ①我… II. ①党… III. ①互联网络—传播媒介—研究—中国—图谱 IV. ①G206.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201481 号

我国社交媒体演进的可视化知识图谱研究

党琼 著

出版人：陈 玉

责任编辑：孙志强

责任印制：吴 波

出版发行： 燕山大学出版社
YANSHAN UNIVERSITY PRESS

地 址：河北省秦皇岛市河北大街西段 438 号

印 刷：秦皇岛墨缘彩印有限公司

策划编辑：孙志强

封面设计：刘韦希

电 话：0335-8387555

邮政编码：066004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1/16

版 次：2022 年 12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978-7-5761-0404-2

定 价：54.00 元

印 张：13.5

印 次：202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00 千字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335-8387718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科学计量与科学知识图谱	6
1.3 科学知识图谱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应用	8
1.4 研究问题与研究框架	17
第 2 章 科学知识图谱的原理与方法	27
2.1 科学知识图谱发展概述	27
2.2 科学知识图谱的概念与功能	29
2.3 知识图谱的基本方法与原理	33
2.4 科学知识图谱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40
第 3 章 我国社交媒体研究合作网络知识图谱分析	44
3.1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特征分析	44
3.2 机构合作网络图谱特征分析	55
第 4 章 我国社交媒体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分析	68
4.1 社交媒体语境研究	70
4.2 政务微博传播机理与治理研究	81
4.3 社交媒体中信息传播研究	89
4.4 新时代媒介融合发展研究	92

第 5 章 我国社交媒体研究热点演化知识图谱分析·····	96
5.1 第一阶段（2008—2011 年）：社交媒体研究起步阶段·····	97
5.2 第二阶段（2012—2016 年）：社交媒体研究平稳发展阶段·····	104
5.3 第三阶段（2016—2019 年）：社交媒体研究快速发展阶段·····	108
5.4 第四阶段（2020—2022 年）：社交媒体研究持续快速发展阶段·····	110
第 6 章 我国社交媒体研究前沿知识图谱分析·····	119
6.1 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呈现·····	120
6.2 政务抖音的功能与治理研究·····	124
6.3 传统媒体的反思与超越·····	128
6.4 社交媒体时代意见领袖再思考·····	130
6.5 微博平台网络舆情研究·····	137
第 7 章 我国社交媒体研究发展趋势知识图谱分析·····	146
7.1 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情绪传播研究·····	148
7.2 政务微信传播机理与治理研究·····	159
7.3 社交媒体可供性研究·····	165
第 8 章 结语·····	174
参考文献·····	181



第1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社交媒体是人们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现阶段主要包括 Facebook/Meta、Twitter、微博、微信、博客、论坛等。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时空生活。社交媒体的出现进一步印证了“地球村”的说法，强化了虚拟社会中来自不同地域和不同空间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带来了媒介技术的革新。进入 21 世纪，社交媒体重新构建的虚拟空间促使全球文化壁垒在不断地缩小，文化的认同使媒介时空突破了狭隘的地域和国家界限，打破了对时间和空间的依赖性，促使网络媒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随着微博、微信、论坛、抖音、快手等新兴网络传播方式的出现，媒介的地域特性被彻底打破，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距离慢慢消失。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网络传播的时间偏向，使“媒介的时空偏向性朝着媒介时空一体性方向发展”（朱海松，2008）。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研究社交媒体传播等议题。

政务新媒体尤其是政务微博作为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重要方式成为研究的重要议题（张雅馨和范晓玲，2022）。政务微博是指由党政机构及其官员开通，经过实名认证的，用于公开政务信息、推动官民交流和加强公共服务的微博账户（陈静和袁勤俭，2014）。2018 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指出政务新媒体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重要渠道，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是引导网上舆论构建清朗网



络空间的重要阵地，是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微博的出现为政府和公众搭建了一座“交心”的桥梁，政务微博在重大突发公众事件中起着信息传递和信息互动的作用。杨光等（2022）以@人民日报新浪微博在河南特大暴雨中政务微博的信息特征为例，研究发现微博关于河南特大暴雨的内容以新闻发布为主，辅以救援进度和灾情祈福等的报道，主要目的是稳定民心 and 缓解公众的恐惧情绪。另外在重大灾难的报道中，政务微博也对英雄人物事迹和各种能够传递正能量的新闻事件进行了报道，强化了公众在面对疫情、洪水、火灾、地震等灾害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此外，政务新媒体具有成为社会治理创新助推器的功能，在风险传播和危机管理中能起到缓解风险和抑制风险的作用。突发公共事件具有复杂性、破坏性、难预测性的特点，对于突发自然灾害的舆论引导和治理需要多方参与，其中政府新媒体在满足公众对灾情的知情权和引导舆论方向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黄飞思和张博（2022）研究发现在灾情报道中带有正能量的微博报道能够安抚和缓解公众的焦虑与恐惧情绪。此外，政务微博的本质是官方媒体，带有政务的属性与特征，在运营和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短板，比如单向灌输式地发布信息，因此一定程度上政务微博忽视了与公众的沟通效果。整体来看，政务微博作为新时代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在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社交媒体受到了学界的关注。手机媒体拓展了传播载体在时空的自由度，以独特的时空传播方式改变了传统信息的传播方式和公众对信息的感知方式。手机将人们链接起来，使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能够突破束缚自主地参与不同话题的讨论，各个阶层的网民可以自由表达他们的意见和观点，促使社会热点事件更大范围地扩散传播。近两年，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社交软件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传播的话语权。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络视听用户总规模达9.44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73亿，日均使用时长为120分钟。由此可见，短视频已经成为当下最热门的社交媒体，它的传播方式已经改变了公众接收信息的渠道和社交习惯。学者何芸茜等（2022）指出短视频的蓬勃发展其本质是文化的创新在行业集

群内和行业集群外围的扩散传播现象。用户生产内容成为短视频平台传播的主要方式，碎片化的内容生产能够吸引更多的用户接收和分享知识。用户借助短视频平台对传统文化进行二次再创作，有助于其朝着多渠道、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缓传统文化衰竭的速度，降低传播中断的概率。此外，在短视频发展的浪潮中，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等，也入驻短视频平台，出现了主流媒体短视频化现象。主流媒体新闻的短视频化能让用户轻松地、直观地、快捷地获取信息，构建自己的用户群体，利用算法推荐契合用户需求的新闻。最先入驻抖音短视频平台的主流媒体是央视一套，此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该政务抖音发表的视频总播放量达到了500亿。

2020年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快速席卷全国，在严格的管控措施下，社交媒体成为居家隔离的民众了解政府政令和疫情动态的主要渠道，社交媒体的社会价值也在此次疫情过程中得到凸显和放大。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因为拥有丰富的多模态符号资源和庞大的用户群体，已经成为政府机关与社会机构发布消息时的首选渠道，是实现有效宣传和科学管理的重要方式。随着“社交疏远”（social distancing）的持续，人们对社交媒体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越来越成为网民介入公共事务、社会管理的平台，是网络舆情的主要载体，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和影响着社情民意。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社交媒体能够及时回应“民生民情”。政府能够借助社交媒体有效地、全面地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护工作，正确地引导舆论，避免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网络信息疫情。当前国内外学者对社交媒体与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主要侧重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研究社交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中的核心作用与传播机制。许多研究表明社交媒体，比如微信、微博、短视频，是公众获得疫情信息的主要渠道，在重大突发事件风险传播的各个阶段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节点。学者张克旭（2020）强调社交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起着“吹哨”预警、风险放大、形成信息瀑布、引爆舆论的核心作用。社交媒体参与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与治理几乎从根本上重塑了我国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防控预警体系。社交媒体可以预测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病率和规模，促使公众及时



地获取有关疫情的信息和资源，促进公众、政府、医疗机构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陈娟和郭雨丽（2020）的研究表明社交媒体，比如微信、抖音平台和微博，可以有效地参与新冠肺炎疫情科普知识的健康干预，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的认知进而改变他们的行为。另外，在社交媒体参与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公众的数据隐私和理性对话也应当引起学界和业界的重视。

国际社交媒体平台的主流在重大突发事件传播中的作用也引起了学界的注意。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彭文忠和曹瀚文分析了 @PDChina（人民日报）在 Twitter 平台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发现社交媒体平台 @PDChina 的报道能够满足受众利用碎片化的视角阅读新闻信息的要求，报道聚焦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事件动态并且报道的内容更加多元化，涉及政治、心理健康、旅游业、教育等。但是我国主流媒体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缺乏强势的话语权，具体体现在粉丝数量较少，大多为中国人且中西主流价值观的差异导致来自不同国家的受众听不见或听不清中国抗击疫情、治理疫情的声音。另外，如果信息披露不及时可能引发公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危机。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构建的虚拟网络空间里具有开放性话语特征，国内外的地理边界在国家社交媒体空间不复存在，这种自由的表象很容易掩盖传播中国与他国之间权力主体的激烈博弈（路璐，2016）。由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立场不同，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无法做到客观公正，且报道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再加上社交媒体平台信息选择性接触机制的影响，受众很容易在信息超载的社交媒体平台根据自己的立场和喜好选择性地接触信息，很容易导致对某一特定群体、国家、民族产生偏见，也容易引发群体极化（彭文忠和曹瀚文，2021）。因此，为了能够更加有效、合理和全面地传播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和让世界看到中国抗击疫情的信息，国际层面应该增强多方联动，打造国际社交媒体传播矩阵，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对话功能积极开展正面的情绪引导。

另一方面是着重研究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社交媒体引发的“信息疫情”（infodemic）、舆情管理和治理策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适逢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信息疫情”的现象和以往相比更加严重。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全球传染病防范主任西尔维·布里安德（Sylvie Briand）博士明确表示社交媒体时代，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

内的暴发，势必会导致“信息疫情”的暴发。以前的许多研究已经表明历史上的每一次大规模的传染病（比如，SARS）的暴发，都会伴随着“信息疫情”的暴发。易艳刚（2020）强调疫情防控和治理工作很重要，但是预防和治理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疫情”也同样重要。历史上每一次暴发传染病，都会同时暴发“信息疫情”。沈可君（2020）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和治理期间，虚假、错误、谣言等信息，比如双黄连可以治疗新冠肺炎，在社交媒体平台呈现出“巴赫金式狂欢”的传播态势，严重误导了公众的认知并引起了社会的恐慌。张子帆和王勇（2020）指出社交媒体传播隐蔽性的特点是使网络空间新冠肺炎疫情谣言泛滥的重要原因，信息的不对称和全民群体传播的情境下导致的网络判断力低下促使网络谣言的扩散，社交媒体的交互性和社会性为网民提供了一个情绪的发泄口，这为新冠肺炎疫情谣言的滋生和发酵提供了空间。社交媒体时代新冠肺炎疫情谣言在网络空间的泛滥给社交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比如国外反华势力企图通过社交媒体制造“政治病毒”，企图污蔑、抹黑、唱衰、瓦解中国人民治理疫情的决心，诱导国际舆论，从而影响我国民众的政治立场、破坏我国的政治稳定。

社交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是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然而公众应该时刻警惕和远离大量不实信息的传播。到目前为止，社交媒体平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谣言的治理成为学者关注的重中之重。侯丽（2020）指出社交媒体公司可以“屏蔽”（block）、“降级”（demote）或“提升”（elevate）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帖子，因此可以删除有关新冠肺炎疫情不实言论的帖子和谣言。此外，还应当从主体的情感维度、沟通维度、认知维度等方面提高公众使用社交媒体的素养。后疫情时代，臧海群（2020）提出在社交媒体治理方面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强化社交媒体平台的主体责任意识和公共治理能力，建构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二是要建立健全社交平台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实现“平台联动”的治理模式。

综上可知，我国社交媒体在信息传递、舆情治理、政务服务、助农直播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学界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对社交媒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就研究方法而言，大部分的学者运用叙事、扎根理论、采访、观察、调研等方法对社交媒体进行了研究。



比如,马小萍(2022)从话语赋权、政治治理缺席、公众情绪疏导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交媒体中谣言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社交媒体中谣言的治理应当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转变政府的行政理念、充分利用社交媒体传递“正能量”及构建网络与政府的良性互动。赵树旺和付佳(2022)运用网络传播叙事理论探讨了社交媒体中网民身份焦虑的问题,研究发现网民对精英的过度崇拜、新时代网民被技术赋予的权利以及消费主义环境中的特殊文本是造成网络叙事中网民身份焦虑的主要原因。此外,近两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学习方法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新的技术方法研究和分析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的数据。例如,晏青和刘钰(2022)分析了微博超话中关于抑郁群体的文本,发现抑郁症患者群体通过微博平台构建情感链接,在这一微博空间他们通过相互鼓励由他助转变为自助。崔家勇和王锡苓(2022)对新浪微博平台有关新冠疫苗和疫苗接种犹豫的15万条数据进行了抽样分析。但无论是对社交媒体定性的分析还是定量的分析都只侧重于对某一具体方面的分析。整体来看,目前的研究缺乏从整体维度对社交媒体进行定量的分析。基于此,本研究运用科学知识图谱的方法,从整体上对社交媒体进行分析研究。

1.2 科学计量与科学知识图谱

在大数据时代,各个领域的信息和数据海量呈现。大数据已经在商业领域得到积极的应用并取得可观的增殖效益,然后学术领域来自不同学科的大量的科学数据尚未获得充分的关注,并且由于对大数据理解的欠缺,研究者对学界存在的海量数据的开发和利用尚处于初级阶段。另外,随着我国各种数据库的不断建立和完善以及对西方各种数据库(比如,Web of Science)的购买和引进的日益增多,可以用来分析利用的数据越来越丰富。并且,随着科技的不断完善,这些学术数据库越来越规范化和标准化,因此科学知识计量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也有很大提高。另外,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用来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软件越来越多且功能也越来越完善,这为学科领域知识组织和知识发掘提供了技术支撑。科学知识图谱是一门新型的知识组织和管理的办法,能够从海量的文献中揭示某一学科领域潜藏的结构关系、社会关系、知

识结构，成为当前科学知识计量学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受到国内外不同学科领域的重视并且被广泛应用，比如，情报学、新闻学、心理学、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

科学计量学的产生和其他学科与方法的兴起一样，也伴随着种种的困扰和问题。

《科学计量学》专刊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举办了一场关于科学计量学学科发展问题的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来自匈牙利和德国的两位学者格兰泽尔 (Glanzel) 和舍普林 (Schoepflin) 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当下科学计量学存在的种种问题。首先是学界对科学计量学的概念和方法论的错误理解和运用。比如，有些研究者对计量学基本概念解释不清楚或存在错用的现象，比如“洛特卡定律”(Lotka Distribution)，更有甚者，有些研究并没有正确地使用“影响因素”“被引率”这些基本概念去评价和衡量个人、机构或国家的科学成就。其次是模糊和混淆了基础研究和知识思辨之间的界限。有些数学家和统计学家积极地发展量化的研究方法，这导致科学计量学更趋向于“技术的形式主义”，简单来说就是相关的研究内容被简单化为单纯的数据呈现而忽略了从知识和学科背景层面对数据的深层次的思辨。再次，人才流失也是科学计量学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主要是因为科学计量学的研究通常不符合社会研究的标准且仅从技术形式对数据进行简单呈现的方式价值有限，因此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学者不得不转向其他学科领域。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科学计量学被政策和规划的利益所左右，因此大部分的研究侧重政策部门和产业部门的技术性操作，而对基础性和理论性的探索较少。他们提出的研究问题引起了学界广泛的热议，促使更多的学者开始反思和探讨科学计量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存在的缺陷。

随着科学计量学的不断发展，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加入了这一研究领域。

学者埃格 (Egghe) 在其著作《信息计量学导论：图书馆、文献和信息科学中的定量方法》中提出了科学计量学研究中的两种路径：数学研究路径和社会科学路径。数学研究路径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数学建模了解一个学科领域的发展情况，这一路径被大多数数学家所认可；社会科学路径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模板，但是社会科学的路径可以弥补计量学单纯的数据呈现的问题，学



者们根据数据结合其表征的社会意义对其进行分析。这两个路径的本质问题是探讨定量的研究是否可以进行分析。有学者提出科学计量不能排除实证分析中的重要访谈方法，因为在对创作者进行访谈时往往能够获得他们创作文献的思想和社会背景。

科学计量学发展到今天，新型的科学知识图谱出现，在新闻与传播学领域得到了应用。应该如何了解我国社交媒体研究的全貌，如何去评价社交媒体研究领域的影响力，是本书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是难点问题。文献计量学为本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文献计量学是一种客观的、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探究一个学科领域文献的分布结构、数量关系和演化趋势，而且也可以确定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和权威机构，甚至挖掘这个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科学知识图谱的方法对我国社交媒体领域的文献进行客观的定量的分析，旨在揭示该领域的重要作者、核心科研机构、研究热点、热点演化和研究趋势等。那么，什么是科学知识图谱？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和不足？它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情况如何？这将是接下来要详细谈论的问题。

1.3 科学知识图谱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应用

目前有关科学知识图谱的界定尚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学者刘则渊提出的有关科学知识图谱的定义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肯定。科学知识图谱是“以科学学为研究范式，以引文分析方法和信息可视化技术为基础，涉及数学、信息科学、认知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诸多学科交叉的领域，是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的新发展”。科学知识图谱具有“图”和“谱”的双重性质：既是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又是序列化的知识谱系，显示了知识元与知识群之间网络、结构、互动、交叉、演化或衍生等诸多复杂关系。目前科学知识图谱在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利用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对媒介使用和媒体融合的研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媒介使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的心理和行为。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国媒介使用的形态正在朝着智能化方向发展。学者张秀丽



(2018)运用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对1998—2018年在中国知网发表的有关媒介使用的文章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媒介使用的范式正在从媒介形态理论转移到媒介融合理论。随着移动端媒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儿童开始使用移动媒体。学者 Subrahmanyam 和 Greenfield (2001) 的研究表明媒介主要通过使用时间、媒介形式特征和媒介内容这三种路径对儿童产生影响。从社会认知理论的维度理解,当儿童的内在需求和媒介所呈现的内容保持一致时,媒介将会对儿童的行为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张雪琳和杨梅(2022)运用科学知识图谱的方法分析了1990—2021年间在中国知网发表的有关媒介与儿童的文献,研究表明浙江师范大学是研究我国媒介使用与儿童认知的重要机构,并且儿童新兴媒体使用成瘾成为当下传播学、医学、心理学关注的热点话题。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受众对媒介的依赖程度逐渐加强,媒介建构出来的形象是受众感知和认识外部世界中人、事、物的桥梁与纽带。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媒介构建的城市形象、女性形象、农民工形象、少数民族形象等。但是这些研究都是侧重于媒介形象某一具体维度的研究。针对这一问题,学者朱玲玲(2022)对2002—2021年间在中国知网发表的有关媒介形象的文献进行了知识图谱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媒介形象研究的热点话题主要集中于媒介构建的女性形象和性别文化、城市形象和文化、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构建的中国国家形象、新媒介的形象变迁四个方面。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内有关媒介形象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内容分析法;二是框架理论方法。这表明定性分析法仍旧是研究媒体使用的主要方法。

媒体融合受到学者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在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我国媒介融合政策的引导。2014年8月,我国颁布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意见》重点强调了推动传播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部署、推进宣传文化领域改革创新的一项重要任务。自此以后,国家新闻广电总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部门陆续颁布了有关促进、深化、加快媒体融合的相关文件。最新的有关媒体融合的文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于2020年颁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该《意见》指出全媒体时代应该加快和深化媒体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在这期间媒介融合一直是业界和学界频

繁关注的热点话题，研究成果丰硕。学界对媒体融合的研究侧重于内容与服务融合方面的研究，业界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大多侧重于行业实践的研究。此外，多元技术的发展支持媒介融合实践，“两微一端”是媒介融合的主要形式和趋势。为了更好地理解学界有关内容融合的研究情况，何雨蔚（2018）利用知识图谱的方法分析了2015—2017年发表在中国知网有关媒体融合的文献，研究发现学界对于媒介融合研究整体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研究者和研究机构之间存在较弱的合作关系，各个研究之间相对独立且缺乏系统的、整体的研究。随后，陈帅彤和殷琦（2018）利用CiteSpace软件对WoS数据库中1995—2017年间有关媒体融合的文献进行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研究发现国际学界对媒介融合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媒体融合与健康传播和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且中国在国际媒体融合研究中的潜力较大。学者张萌（2021）把媒介融合研究的时间线放长（2000—2020年），对在中国知网所收集的媒介融合的文献进行了关键词聚类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媒介融合的研究一共分为三个阶段：前期的理论概念探索阶段（2000—2014年），中期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阶段（2015—2017年）和后期朝着多元化发展的研究阶段（2018年）。整体来看，随着我国政策导向的指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媒介融合研究的实践案例和理论研究也随之发展，相关研究议题也更加多元和丰富。

二是利用科学知识图谱对新闻与传播学领域新兴或热门学科的研究。近几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计算传播学、算法新闻、科学传播、智能传播、数据新闻、社交机器人等成为新闻与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计算传播学是计算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部分，主要关注人们传播行为的可计算性，以传播网络分析、传播文本挖掘、数据科学等为主要分析工具，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地收集并分析人类传播行为数据，挖掘人类传播行为背后的模式和法则，分析模式背后的生成机制与基本原理，可以被广泛地应用于数据新闻和计算广告等场景。计算传播多用来研究社交媒体平台网民发表的海量的信息，运用自然语言等技术提取用户的主题意愿和情感倾向。学者余世红和杨锦玲（2022）收集了2006—2020年间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发表的有关计算传播的SSCI论文，运用知识图谱分析软件CiteSpace对所收集的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研究表明国际上越来越多的



学者和机构关注计算传播学的研究，但是计算传播的学术研究严重滞后于其产业的发展与应用。值得注意的是计算传播学的研究是建立在跨学科的基础上，传播学也已经成为计算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在国际学术圈，中国传播学者在计算传播学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数据新闻是大数据时代新闻业不断适应媒介环境变化而探索出的新闻生产的新方式，开放的数据、严谨的叙述逻辑、恰当的可视化呈现方式共同构成数据新闻的基础。有关数据新闻的宏观全面的研究方面，傅居正和喻国明（2018）对1992—2018年间发表在WoS数据库的有关数据新闻的外文文献进行了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研究发现美国的学者和科研机构是数据新闻的主要研究者和领航者，而亚洲和中国的学者和科研机构在数据新闻的研究领域存在感较弱，机构和学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较少，尚未形成稳定的学术共同体，这表明国家有关数据新闻的研究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此外，国际学界对数据新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数据新闻社会性链接的研究；二是对数据新闻伦理与场域的研究。

当前，推荐算法已经深入信息生产、传播、分发的各个环节，伴随而来的是它带来的伦理、社会和技术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丁睿豪和夏德元（2022）对2010—2019年间在中国知网发表的关于个性化算法推荐的文章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传播学领域有关算法推荐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算法推荐的应用研究，比如个性化推荐平台和个性化推荐技术研究；二是算法推荐产生的传播效果研究，比如算法推荐下产生的信息茧房、回音室、过滤气泡、群体极化等传播效果的研究与治理；三是算法推荐的伦理道德问题，比如算法推荐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研究以及对算法推荐产生的伦理问题的治理研究；四是推荐算法的扩张研究。最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交机器人频繁在网络空间出现，已经成为网络环境中一个特殊存在。许多学者已经研究了社交机器人在美国大选、中美贸易、俄乌冲突和重大突发事件等中的作用和运行机制。最近两年社交机器人受到各界的关注，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社交机器人能够促使网络信息生态向“人机共生”的态势转变，另一方面它能够传播虚假信息、扰乱政治环境、危及公众的认识和判断等。



截至目前,许多有关社交机器人的文章出现,郑越和周予晴(2021)对发布在 WoS 数据库中的有关社交机器人的文献进行了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他们的研究发现当下国际对社交机器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从技术层面研究社交机器人的检测功能;二是社交机器人的网络行为研究;三是有关社交机器人负面影响的预防和治理研究;四是如何建立社交机器人信任机制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定性的或技术层面的研究,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学界还在探索社交机器人对公众情绪和舆论影响的机制,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更加注重对社交机器人在网络空间的治理。

社交机器人的出现推动了智能传播的发展,智能传播受到了各界广泛的关注。为了理清当下我国智能传播的研究状况,彭聪(2020)对 2013—2019 年间在中国知网发表的有关智能传播的学术论文进行了知识图谱分析。他的研究表明我国有关智能传播的研究大多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但是技术获取新闻数据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大多数关于智能传播的研究侧重于案例分析、传播治理与管理等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呈现出跨学科的特性,但是学科融合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另外,智能媒体的研究现在也引起学者郑博临和栗珊(2021)的关注。他们分析了近 20 年在中国知网公开发表的有关智能媒体的文献,研究发现智能媒体的研究侧重于研究如何提升中小学生和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网络平台视角下媒介素养问题和伦理治理问题等。

三是新闻传播学领域网络舆情和个人隐私的知识图谱研究。网络舆情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社会的矛盾在网络空间的投射和延伸,是网民对重大社会事件产生的各种理性和非理性的意见、观点、情绪的总和,是衡量网民反馈的晴雨表。智能媒体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导致网络舆情一经出发就能瞬间引爆全网,因此网络舆情的治理与管理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学者张心蕊(2021)利用知识图谱的方法探究了我国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研究的整体概况,研究发现学者们对官方舆论场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相关的研究主要围绕突发网络舆情的情况下,主流媒体和权威媒体的公信力在引导和监督方面的正向作用。另外,随着网民意识的觉醒和提高,民间舆论场也受到了学界的重视,侧重于研究社交媒体平台网民的情绪表达和主题分析。较早运用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对网络舆情进行综述的是学者林玲和陈福集。他们的研究表